

試論人生佛教的兩個弘化典型

——印光與太虛（二）

本文榮獲九十五學年度周海德居士獎學金

● 吳孟謙

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班

三、弘化立場：一門專修與八宗並弘

在弘化立場方面，印光堅定地秉持「一門專修」，大力地弘揚淨土法門。這有兩個原因，一是簡易，二是契機。上文曾提及，印光鼓勵在家學佛，敦倫盡分，而淨土念佛法門的簡易特色，正能方便不同身分職業的人在一切時、一切處修行，不必定要削髮披緇、避居山林。他說：

念佛一法，乃背塵合覺，返本歸元之第一妙法。於在家

人分上，更為親切。以在家人身在世網，事務多端。攝心參禪，及靜室誦經等，或勢不能為，或力不暇及。唯念佛一法，最為方便。早晚於佛前隨分隨力，禮拜持念，回向發願。除此之外，行住坐臥、語默動靜、穿衣吃飯，一切時、一切處，皆好念。

淨土法門的簡易方便，正可使佛法的修持普及化，人間化，也能適應當時的動亂時局，無論生活如何紛擾，只要心中肯念茲



在茲，就能夠獲得實益。其次，淨土法門的契機性，更是印光專弘淨土的因素，他說：

藥無貴賤，愈病者良；法無優劣，契機則妙。在昔之時，人根殊勝，知識如林，隨修一法，則皆可證道。即今之世，人根陋劣。知識希少，若捨淨土，則莫由解脫。

又說：

淨土法門，乃一代時教契理契機之特別法。下自五逆十惡，上至等覺菩薩，皆當修習，皆可即生超凡入聖。其餘所有一切高深玄妙之法，多是契理，而絕不能普契上、中、下三根之機。

這兩段文字，分別就時節因緣上與法門較量上來表顯淨土法門的殊勝。因淨土法門不單仗自力了脫生死，更有彌陀的大願力

與名號的功德力，能夠使眾生不須斷惑就能憑藉強大的信願心與持名功德，往生西方淨土，永出三界，速成佛道，因此成為通途法門之外的特別法門。擾攘動盪的現代中國，環境實在太無常，人心實在太惶惑，印光弘揚淨土法門，確實契合廣大人民內心深處的宗教渴求。他又說：

須知了生死，愚夫愚婦則易，以其心無異見故也；若通宗通教，能通身放下，做愚夫愚婦工夫，則亦易。否則通宗通教之高人，反不若愚夫愚婦之能帶業往生。

佛經三藏十二部，內容浩如煙海，能通一經已經極為不易，若必欲通宗通教才能修行，不免令人望之卻步。故此語不啻給愚夫愚婦最大的學佛信心。又說：

現世國界危岌，尚欲以危險時際，有限精神，作不急之法務，企得大通家之名聞，



以充體面，致自己專修一事，竟成顛預乎哉？倘淨土法門，悉皆諦信深知，再研楞嚴及各經論。…否則入海算沙，腦暈心迷，說食數寶，飢寒莫濟，知好歹者，決不以吾言為河漢也。

可以看出，印光始終站在實修的立場來弘法，不僅不鼓勵，且反對在沒有切實受用的前提下廣泛研教。他也認為如能深信淨土法門者，即使一字不識也能了生死。他舉服藥之喻云：

念佛修持，如服藥然。能明教理，如備知病源、藥性、脈理。再能服藥，所謂自利利他，善莫大焉。若不能如是，但肯服先代所制之阿伽陀藥，亦可愈病，亦可以此藥，令一切人服以愈病。祇取愈病，固不必以未知病源、藥性、脈理為憾也。

由此可知，印光教人不需看

經論，是從念佛修持的角度上說，因經論深廣，法門眾多，縱使能遍研經論，也未必能了脫生死；但若從住持佛法、方便度他的角度上來說，也自當廣研經論，印光自身即是深入經藏之人，只是此一層面他並不常提。

與印光的專弘淨土不同，太虛曾對中國大乘八宗做了判攝與融貫，建立起「八宗平等」的佛學體系。故其弘化立場是八宗並弘，不拘門戶，而尤重視佛法與新時代的結合。太虛希望將弘法事業普遍推廣於社會各階層，而聽眾既雜，所講的經論就必須廣備各宗教義，才能滿足不同根器眾生的需求。此外，說法的內容「若循舊式，必難將佛學打入思想界之中心，引起人普遍的研究。」因此講演佛法者必須注意民族心理與世界動向，使佛法能夠與科學的、組織化的社會趨勢相結合。此不僅需要對藏經有精深的研究，還要能夠旁通世間學術，加以熟悉運用來化導不同根器的眾生。太虛認為《華嚴經》

中提到的「菩薩為利益眾生故，世間技藝，靡不該學。所謂文字、算數、圖書、印璽、地水火風種種諸論，咸善通達」，即是當今弘法者的典範。然而太虛此一論點，不免又有過度理想化之嫌，因《華嚴經》中此段文字所講的菩薩，乃是十地菩薩中第五地「難勝地」的大菩薩（菩薩摩訶薩），而非尚未出三界、了生死的凡夫位菩薩。以一見思煩惱未斷、生死苦海未出的凡夫，遍學一切世間出世間法，是否是佛法修證次第的本意，恐有值得商榷之處。

太虛又主張博綜融會古今中外大小諸乘，來建設新時代的佛教，也即「不是依任何一古代宗義或一異地教派來改建，而是探本於佛的行果、境智、依正、主伴而重重無盡的一切佛法。」但必須是「以中國二千年來傳演流變的佛法為根據，在適應中國目前及將來的需要上，去吸收採擇各時代、各方域佛教的特長，以成為復興中國民族的中國新佛

教。」太虛的此一偉大理想，至今尚未有實現的希望。但無論如何，其重視吸納社會思潮、整合佛教學派、加強團體組織以賦予傳統佛教新形式，皆是為了使傳統佛教能夠跟得上時代的步伐，適應大環境的變遷，在此基礎上利益更多眾生。其用心之深細、眼光之高遠、氣局之宏大，在當時確實無人能出其右，也由於他的佛學詮釋極具新意，故能得到學術界的關注與知識青年的共鳴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太虛八宗並弘的規模雖廣大，他仍沒有忘記佛法不是以博學洽聞，而是以真修實證為最終目的。他說：

教理之研究，非以增加知識為目的，而以能導進修行、趣令證聖果為目的；若研究教理而不趣重行證者，則研究教理不但無用，或反有深害，耗一生之精力，最多亦成就一時髦學者而已，且能因之增加貪求名利恭敬，及貢高我慢等無量煩惱。



可知太虛研學弘法的本末輕重極為清楚分明，絕不以學理的鑽研妨礙修行求道。這確是傳統佛教不可推翻的核心精神，值得今人警惕。

總上所言，印光以了生死的佛法第一義為出發點，單提簡易方便與契合時機的淨土法門作為其弘化的基本立場，反對時人做大通家，而給予廣大的愚夫愚婦以無限的信心；太虛則站在配合時代思潮、廣攝眾生之機的立場上，主張八宗並弘，並欲通貫古今中外一切佛法，建構一個新時代的佛學體系，因而能得到學術界的共鳴。平心而論，印光專宗淨土、不重研教的立場，固有其背後的一番苦心，然而欲人專修淨土、確立知見，勢必不能不兼重經教的闡揚、義學的發展，否則容易流於空疏孤陋，難以取信於人；而太虛八宗並弘、博收遍攝的立場，對於佛教義理的維持與發展，固然相當有利，然而真能融貫諸宗者百不得一，且落實到實修上，除非自創新宗，否則

終不能不取定一宗以為入手處，否則亦易流於支離汗漫而無所歸。因此若將兩人與宋明理學家做一比對，印光之弘化立場可擬王陽明，太虛之弘化立場可擬朱子，二說之間似相扞格，其實適足以相輔而相成。

四、弘化方法：化導人心與整頓制度

中國佛教叢林發展到清末，祖風蕩然無存、只存形式者甚多，逐漸成為中國宗族制度的「子孫廟」。法派與剃派的傳承關係，取代了十方選賢制度，致使叢林中弊端叢生。自戊戌變法以迄民國的一波波改革運動中，社會屢興反宗教、反迷信的口號；政府亦多次推動「廟產興學」，其中藉興學之名而驅逐僧侶、侵奪寺院田產法物之事件屢見不鮮，佛教無疑面臨危急存亡之秋。在此時局之下，印光並未捲入世俗的洪流之中，高倡佛教的改革與自救，反而掩關加功用

行，這並非欲做個自了漢，而是有其深刻的考量。當時佛教的危機並不只是佛教自身的問題所導致，而是牽涉到近現代中國政治社會的紛亂失序，佛教的命運與近現代中國的命運緊緊牽繫，不可分離。當整個中國政治社會都處於動盪、迷茫、尋求生存之時，佛教所受到的衝擊已不是單單整頓叢林即可避免，而政治社會各方面的問題，也非出家人的力量可以改變。依據佛教三界唯心、萬法唯識的義趣，大時代的災難自是眾生的共業，根本的解決之道，還是在於心術與風俗的改良。印光正是在這樣的考量下，以其言教身教來化導人心，扭轉共業。

印光所特別關注者，厥為因果之理與家庭教育。他認為：「今日世道之亂，為開闢所未有，究其根源，總由家庭失善教，及不講因果報應所致也。」只有深明因果之理，人心方能趨善；只有重視家庭教育，風俗方能淳美。印光的此一看法並不是

什麼新見，而是中國儒學與佛學傳之千載的智慧，他認為時代再怎麼變，世界再怎麼新，這些道理終究是「救國救民之正本清源，決定要義。」他為了導正人心，以數十年苦修實證的慧眼重刊經典、印行善書，並破闢偽經與邪見，樹立修學典範，使廣大佛教徒的知見得以開明。陳永革先生稱他所弘之法是「民眾佛教、社會佛教、平民佛教」，良有以也。印光弘化的重點，非是傳統佛教的全面復興，而在於拈出佛法之血脈精神，建立廣大佛教徒的正信正見，以作為處世、修行的基礎。他弘化的方法，也非開辦道場、登座演法，而是藉由其書信文章的廣泛流通，傳平易之道、解眾生之惑。相較於舊式的叢林講經或新式的學院研究，更加貼近人們的生活，潛移默化著神州大地千千萬萬的信徒。因此他雖刻意低調，行跡不廣，影響力卻依舊無遠弗屆。

律宗高僧弘一曾讚歎他：「大德如印光法師者，三百年來



一人而已。」東初法師於其《中國佛教近代史》中亦言：「大師應跡垂化數十年，蓮池以後，法化之廣，啟導之深，未有如師者。」當時中國人約有六、七成的人信仰淨土宗，這一方面是因為淨土宗自明清以來已是佛教信仰的主流，一方面也是因印光將叢林佛教擴展到全民佛教，使念佛法門的信仰與實踐，獲得了社會化與普遍化的落實之故。今觀其《文鈔》中的書信往來對象，上自佛教高僧、名流居士，下至無名百姓皆有之，一如其所弘揚的淨土宗，其化導範圍亦可謂「三根普被」矣！

印光曾自言：「並不與人說做不到之大話，任人謂己為百無一能之粥飯僧。」此種自認平凡的態度，實恰恰突顯出他不平凡的高度。印光的信徒更對他做了如下形容：

印公老人一生行履，的確無甚奇特，祇是切切實實，做他性分中事，行他性分中

行…祇是一味率真，教人敦倫盡分，堂堂正正做個人，老老實實念佛，從不談玄說妙，更不炫耀學問，故示深遠。

印光處在眾聲喧嘩、衝決網羅的時代，卻示人以老實謹愨的行者之姿，也有提醒學佛者莫受狂肆高蹈、擺盪游移的時代風氣所感染的身教意味。而此一態度，在資訊爆炸、人心浮動的廿一世紀當代社會中，依舊值得今人重視。

太虛所表現出的形象與印光大異，他具有吞吐一世的豪傑氣概，自年輕時便與革命黨人、權貴名流常相往來，有「政治和尚」、「佛門霸才」之稱，對於中國乃至世界的亂局，時時流露出隻手擎天的自負與力挽狂瀾的使命。正因他對於時勢極重視、極敏感，所以絕不甘於終生閉門潛修，而希望為佛教、為民族開創新局。他說：

當此世亂，沙門不可安於自修，而當博施濟眾、涉俗利生；待正教普被，在家眾堅固時，再專習至法，為人天師。

他不僅在中國各處演說弘法，遊化之跡更遍覆東南亞、歐美、埃及、印度，其弘化方式，除了上文曾提及的結合時代思潮與學說來闡發佛學外，更重視叢林制度的整頓與僧才的養成。他於1915年作《整理僧伽制度論》，希望能建立全國性的統一佛教組織，然而，由於各種因素，始終無法具體落實。此後數年，他陸續發表〈僧制今論〉、〈建僧大綱〉、〈菩薩學處〉，已將重心放在僧教育上，尤重視僧教育學程的次第規劃。大致的重點包括：（一）訂定有次第、有系統的教育學程；（二）強調清苦淡泊、勤習勞動的學習態度；（三）習律、學教、修證三階段不可偏廢。且要培養適應現代社會、住持現代佛教的僧才；

（四）淘汰劣僧，施以僧外之生產教育，並整頓僧寺產業。由此可以看出太虛的教育改革，乃是立基於傳統叢林教育解行並進的精神，而加入了配合現代社會的成分。

太虛一生從事佛教改革，但到最後他認為自己是失敗的，他曾做了以下的檢討：

我失敗弱點的由來，出於個人的性情氣質固多，而由境遇使然亦非少，例如第一期以偶然而燃起了佛教革命的熱情，第二期以偶然而開了講學辦學的風氣，第三期以偶然而組織主導過中國佛教會，大抵皆出於偶然倖致，未經過熟謀深慮，勞力苦行，所以往往出於隨緣應付的態度，輕易散漫，不能堅勞強毅，抱持固執。

其實太虛所說的「隨緣應付」與「輕易散漫」，是較為嚴厲的自我批判。客觀上而言，在



紛亂的時局中從事改革，本就有許多現實條件上的限制，縱使他英才過人，終究無法抵抗時代洪流的泥沙俱下；再者他的悲心甚切，有時不免立論太急，而想做的事太多，也使他如多頭馬車，難以專一，倒並非他自身放逸懈怠所致。以太虛的淵博學養與過人眼光，當初若能暫緩其佛教救世的急切之心，而以篤實漸進的態度，專心致力於小規模的辦學與改革，待火候稍成後再向外推擴其事業，相信必能造就出一批學行精實的僧才，也不致養成許多「佛化新青年」的淺薄狂放，造成其與保守派之間的心結。

話說回來，太虛的種種改革理想，雖因時局動盪而落空者多，然而其大格局、大視野的改革精神，以及敢說敢為、勇於任事的氣魄，仍為佛教的現代化奠下了相當的基礎與規模。今日台灣提倡人間佛教的各大道場，包括星雲的佛光山、聖嚴的中華佛研所與法鼓山、證嚴的慈濟功德會等，皆承繼太虛的弘化路線而

來，他們所從事的弘法、學術、出版及社會福利等各項事業，在海內外都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，也帶給了台灣佛教界生機蓬勃的氣象。

總結來說，印光與太虛都深憫佛法之衰與眾生之苦，而在弘化方式的側重上有所不同。印光心知時代之共業難以一日而扭轉，因此特重正本清源的工作，高擎德行為身教，宣講佛法知見為言教，期以導正迷亂的人心；太虛則本於豪情悲願之不容已，致力於叢林制度的改革與僧伽教育的施設，希望藉由制度的規劃與整頓，使佛教的發展走上正軌，進而貢獻於世。就印光這一端以衡太虛，不免有躁進之感；就太虛這一端以衡印光，又不免有保守之憾。實則這兩種典型之間，並無一定的優劣高下，且皆為現代中國佛教之所需，唯在學者善自取師而已。㊟（待續）